刘伯承军事文选

解放军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出版说明

刘伯承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外著名的军事家，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他所总结的作战经验、建军经验及其军事理论著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刘伯承写过很多著作，起草过很多文件，作过很多重要讲话。由于战争环境，有些材料散失了；有些与其他人共同署名的文件，因找不到原始手稿，难以断定是否是刘伯承起草的。现在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的九十二篇，只是当前收集到的确知是他的著作的一部分。其中很多是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凡收人本书的著作，有原件或公开发表过的，基本上都保持原貌，只对个别文字和史实作了订正；对讲话记录稿做了文字上的整理。书中注释，凡是《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的引文，均依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刘伯承军事文选》最初是由李达和杨国宇、陈斐琴等编辑的，一九八〇年六月经中央军委批转军事学院审查。在院长肖克、副院长贾若瑜指导下，由王三欣、赵温玉、孙继章、夏韵芳等，在原有文稿和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核对，对收录文章的篇目作了调整、充实，对个别文字、史实作了订正。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还加了题解和必要的注释。在完成初稿后，又征询了有关方面的意见，最后由军事学院领导定稿。一九八二年二月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以军事学院名义、由解放军出版社内部出版（征求意见本），发全军师以上干部学习并征求意见。

《文选》（征求意见本）出版后，收到有关方面的一些来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这次公开出版发行前，在国防大学张震校长兼政委和黄玉章部长的领导下，由孙继章、夏韵芳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征求意见本作了进一步审读、考证，对全书进行了修订，增补了《军事报告》（一九二六年）、《现在要确定或恢复的教育工作》（一九三八年）、《交通斗争是相持阶段夺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一九四〇年）、《斗志和斗法是用兵的把柄》（一九四八年）、《关于四兵团的行动问题复军委电》（一九四九年）、《野战军向川黔进军作战的基本命令》（一九四九年）、《解放西南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九五〇年）、《集团军进攻战役想定作业的目的》（一九五二年）、《对国防现代化的一些见解》（一九五四年）等九篇，并经中共国防大学党委常委审定。在编辑过程中，于泽民、邹经参与了文字订正工作。

一九九二年八月

刘伯承军事文选

军事报告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今天伯承作军事报告，分作两段，一是全国的，就 x 是本党党军[1]北伐军事大概；一是四川的，就是四川军事的局面。但是说到军事上面，多有秘密不能知道的事件，兹仅就伯承所知道的向各位同志作一简略的报告。

（一）本党政府自从唐生智[2]倾向本党之后，虽有出师北伐的预备，但是如果敌人不十分压迫我们，本党政府也不能劳师动众，辄以武力征服人家。可是敌人却着着进攻，叶开鑫[3]受了吴佩罕的使命，进占长沙，使唐生智不能不退衡州（阳），同时孙传芳[4]也有出兵助吴佩孚[5]的意思。当时本党政府出师，只要巩固在湖南的革命势力，口号只是打倒吴佩孚。对于孙传芳取和缓的态度，以期不致发生冲突。所以对于湖南取攻势，对于江西取守势。自我党军出师北伐以后，不数日唐生智即将长沙克复。蒋总司令介百也到湖南，遂下总攻击令，不久便攻下汉口，包围武昌，北出武胜关，以与樊钟秀[6]军继续把吴佩孚的力量打倒。同时孙传芳的袭我广东的计划，也给我党军得知。他是要乘我剧烈战事的时候，分兵袭击我湖南和广东，他处处可以攻击我党军军事上的要害，使本党政府忍无可忍，不能不和他决裂，于是有进攻江西之举。进攻江西的军队，一面自赣县吉安以东前进，以攻南昌。第七军又由鄂城攻下德安，把敌人的南浔铁路截断。接着，同时夏超[7]也从浙江方面响应我军，牵制其后。我党军于十一月四日克服九江，九日克服南昌，江西就算完全入我党军掌握。孙传芳此次退却，实出于不意，各路队伍溃散的不易收束，现在已不成形势了。昨日此间得的消息说，孙传芳秘密赴天津，向奉系[8]求救，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就趁此机会各组织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孙传芳的政治命运，也就从此告终。武昌十“双十节”[9]克服，把原有敌人完全缴械。本党党军，出武胜关与樊钟秀军联成一气之后，围攻信阳，此时响应我们的就是国民军二军部队，再者，吴佩孚的部队也人各一心，不能振作，亦算不成问题了。现在尚成为问题者就是奉系。奉系分出鲁系以后，内中又分新旧两派，意思还不统一。张宗昌[10]军已到徐州，口中说是援孙传芳，其实不忘去年被逐之仇，不过欲趁此得点便宜。张作霖[11]于十一月十一日到了天津，十二日开军事会议，大概议题是绥远军事，河南军事，长沙军事。会议的结果，大体不外此刻定将京浦、京汉，如徐州、郑州握在掌中，以观风色。至于福建方面，周荫人[12]想扰我东江。何应钦[13]军长本主张先取福建。彼时彼军乘我党军在江西未十分得手之际，先来攻我党军。我军迎头痛击，迳取永定、松口等处之剧战，敌人已不成军。福建民军因而纷纷四起，赖世璜[14]又从江西横攻福建，福建已完全克复了。现在来说西北军[15]的现势。西北国民军的纪律和他的为国服务的精神，是我们向所称道的。总理[16]在时就派徐孝龙前往联络。此次冯焕章[17]同志到俄游历以后，有很彻底的认识，以为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要革命非实行总理的主张不

---

① 这是中国共产党四川军委委员刘伯承，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口——泸（州）顺（庆）起义前三天，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公开身分，为策应北伐、推动革命，在中国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刊登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六、七日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编的《中国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月刊上。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最初尝试，刘伯承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

可，所以他全体加入本党，实行国民革命。他的本部精兵尚有十五万，二、三军复起者尚不在内。大概全部兵力现分三路：一是由甘肃以出陕西，一是由绥远以出太原，一是屯京绥路上。出陕西的胜利征候，我们是知道的。田颂尧[18]收了孔繁锦、吴心田逃来四川的残余部队。焕章同志的驻成都代表陈经新，当与特务委员会通函及取联络。出太原的胜利征候，商震加入革命军，为焕章同志之副司令，是山西义不存问题，京绥路越发稳固了。鄂西方面，卢金山、阎得胜、张联升、于学忠、张福成等残余北军，自杨子惠[19]二十一日就军长职，党军已由汉口派兵西上，协同子惠肃清鄂西。我革命军处处胜利，政府成立不到两年，竟能将全国三分之二的地面，划人革命势力的范围，这实在是一件大可庆幸的事。我们一面不能不归功于革命将十之忠于党国，能将多数敌人一一打倒；一面却不可忘掉民众的力量，民众予我党军以巨大的助力。因为本党是代表各阶级利益的党，民众一致拥护，所以努力加入革命战线，虽然是他们自身的要求，但亦是我们同志之领导得力。如当战争之时，人民有为党军指引路径的，有为党军扰敌后方的。至于箪食壶浆，更不算一回什么事。老实说，此次北伐的胜利，不完全是革命军本身的力量，而是民众拥护本党的力量要占大多数。无论党内外，谁也不能否认的。我们的同志，对此宝贵的表现，务须深刻的记着，切实从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方面下一番苦功夫，将革命基础筑稳才是。若只图军事上的发展，革命是不容易成功的。

（二）四川军事情形，非常复杂，就是伯承在当中混了十多年，有人只问我现在军队的番号如何，我也不能一口答出这简单的问题。因为某师某旅某司令的番号，都是重复至三、五个不等。我们如必要得一个明确概念，只好以形式上能发号司令之将领为纲，作个报告。据去年将领善后会议统计，四川枪支在军队手中的，约有十七万余支，分隶于九个将领之下。九个将领者，即刘湘[20]、杨森、刘文辉[21]、邓锡侯[22]、赖心辉[23]、刘成勋[24]、田颂尧、何光烈[25]、刘存厚[26]是也。大概刘湘枪支约有三万余，杨森枪支约有二万余，刘文辉枪支约有三万余，邓锡侯枪支约有四万左右，赖心辉枪支约有一万余，刘成勋枪支约有一万余，田颂尧枪支约有一万余，何光烈枪支约有六千左右，刘存厚枪支约有四千左右。这九个将领的思想，都想做一个统一四川的“英雄”。因此所用的手段，都是纵横捭阖[27]，或以同学相联合，或以同乡相联合，或以亲戚骨肉用联合，以求达到统一四川之目的。无如四川只有一个四川，在一个四川之内，互争雄长发生的事实，就不免有同学自残，同乡自残，亲戚骨肉自相残。携贰[28]的故事，层见叠出。到现在都一致感觉统一四川之困难，失同情于民众之危险。且加以自己部队又发生无数裂痕。自趋于崩溃之境，或者他们心坎中，都现了“此路不通””四个大字。各部队也成立政治训练处，近来都成一种风气，这也是看到本党党军处处胜利，改变过来的。用唯物史观说来，四川是一个封建社会，很容易养成英雄思想。四川尚在农村经济组织时代，又是很容易发生小团体的组织。这都是环境烘托出来的事，毫不足怪的。决不能因此就说他们不爱同，故意蹂躏老百姓。如像我遇着的将领，谈到民间颇受军人的痛苦，大多都现悲悯的、自失的情绪出来。现在本党在全国军事上，已有了很大的胜利，四川在革命军势力包围之中，成了瓮中之鳖。四川将领只有购条路可走：一条是反革命，就立刻放弃四川地盘，冲出此包围圈而与破裂有痕之奉系联络，以缓须臾之死；一条是革命，不但可以保留固有地位，且可以图事业之发展。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非说，他们自然该革命，就利益说，他们尤其要革命。他们一齐来革命，这种事实，在不久之将来，一定可以实现的。但是他们不认识本党革命的理论，我们同志不可不认识清楚，是可以转变他们的。如果他们都插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我们同志都更应加倍努力于民众运动，使民众能确实的监督军人，且趋于真实革命之途才有结果。否则单靠军事运动，是根本危险的，这是各位同志不可不深刻注意的。

注　释

[1]本党党军，系指国民党国民革命军。

[2]唐生智，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前敌总指挥。

[3]叶开鑫，湖南军阀赵恒惕部第三师师长、赵被驱逐出湖南后，叶投靠了北洋军阀吴佩孚。

[4][5]孙传芳、吴佩孚，都是北洋直系军阀。

[6]樊钟秀，西北“靖国军”第二路司令。孙中山任命他为“建国豫军”总司令。

[7]夏超，当时的浙江省省长，在北伐军到达江西前线时，宣布独立，倒戈反对孙传芳，响应北伐军，被孙传芳打败。

[8]奉系，指奉系军阀，北洋军阀派系之一，以奉天（府治，今辽宁省沈阳市）籍张作霖为首领。

[9]双十节，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口爆发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军攻下了武昌，各省纷纷响应，清王朝迅速解体。国民党政府把每年的十月十日定为“双十节”。

[10]张宗昌，奉系军阀之一，北伐战争期间支援孙传芳对抗国民革命军，在河北滦东被北伐军打败。

[11]张作霖，泰系军阀首领。

[12]周荫人，北洋军阀孙传芳的部属，当时任福建军总司令，反对北伐战争，后为北伐军所消火。

[13]何应饮，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北伐军东路军总司令。

[14]赖世璜，原为赣军师长，一九二六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长。

[15]西北军，指冯玉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

[16]总理，指孙中山。

[17]冯焕章，即冯玉祥，西北军总司令。一九二六年九月，当国民革命军进抵武汉时，他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小平等帮助下，在五原（今属内蒙占自治区）誓师，绕道甘肃东进，参加北伐战争，十一月占领陕西、甘肃两省。

[18]田颂尧，四川旧军队将顿之一，川西北屯殖军总司令兼国军第二十二师师长。

[19]杨子惠，即杨森，四川旧军队将领之一，北代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20]刘湘，四川旧军队将领之一，一九二六年为川康边防督办四川督办，有十一个师、两个混成旅番号的部队，枪支约三万二千。

[21]刘文辉，四川旧军队将领之一，一九二六年为四川军务帮办兼国军第三十一师师长、下辖四个帅、六个旅番号的部队，枪约三万二千支。

[22]邓锡侯，四川旧军队将领之一，一九二六年为四川清乡督办兼国军第三十师师长，下辖五个师、约六个旅番号的部队，枪约四万支。

[23]赖心辉，四川旧军队将领之一，一九二六年为四川省省长兼第一师师长，下辖两个师、五个混成旅番号的部队，枪约一万一千七百支。

[24]刘成勋，四川旧军队将领之一，一九二六年为西康长垦使兼第四师师长，下辖两个师、约五个旅番号的部队，枪的一万支左右。

[25]何光烈，四川旧军队将领之一，川军第五师师长。

[26]刘存厚，四川旧军队将领之一，一九二六年为川陕边防督办，约有四个旅番号的部队，枪四千支。

[27]纵横捭阖，战国时期（公元前四七五年～前二二一年）苏秦、张仪等策士游说诸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手段和方法。后以纵横捭阖指在政治上、外交上使用分化和争取的手段。

[28]携贰，语出《左传·文公七年》：“亲之以德，皆股肱也；谁敢携贰？”指亲附的人产生离心，甚至叛离。

军事问题补充报告①
（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

同志们！恩来同志的军事报告非常周详，我今日所要报告的，是偏于在军阀军队工作方面的情形，照着以下的次序来说一说：

一、帝国主义与豪绅军阀封建制度南北军阀是代表什么；

二、军阀制度本身的矛盾与必然的崩溃；

三、军阀军队的成份与其一般的情形；

四、对军阀军队的工作；

五、党员军事化。

一　帝国主义与豪绅军阀封建制度南北军阀是代表什么

中国式的豪绅封建军阀制度，是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主要基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中国境内开设工厂，建立如网一般的收买原料的买办制度，输入多量的工业制造的日常必需品……，这种经济侵略，使中国经济落后而不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成封建势力，它多不是与封建豪绅地主经济有极端密切关系，帝国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式的贸易侵入中国的农村，这种现象，使中国的豪绅地主更加商业化，更加重剥削去作帝国主义压榨中国农民血汗的中介，同时也就作军阀统治的支柱。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扩大会议议决案说，从劳苦群众的观点看来，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的统治，与蒋介石、白崇禧、唐生智、汪精卫都是一样的，所以北洋军阀代表高等官僚及商业高利贷资本，而南方军阀是地主高利贷者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种反动势力，对于工农的仇敌关系完全一样，一点也没有什么变动。这种分析是正确的。

二　军阀制度本身的矛盾和必然的崩溃

二十年来中国的大小军阀互相吞并的战争者，现在急于都完全隶属于国民党旗帜之下，秋白说这些豪绅地主阶级的军队，来听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的领导，是尾大不掉[1]的。又说国民党虽然成为豪绅资产阶级的军事联盟，他们的阶级利益是冲突的，这样分析，从资产阶级所欲消灭杂色军队，统一中国而言，豪绅地主则各自不断地扩充武装，从小小的民团以至军队，他们都日趋急烈地相互吞噬，亦就是相互反对别人的侵犯。一般资产阶级受着豪绅地主性的军阀之苛捐杂税重重压榨，而经济财政急剧的破坏，这是根本的矛盾点。从这类事实看来，是正确的。米夫同志[2]关于国际执委九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之决议案的文中说，中国军队逐年增加，数目现达两百万，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军费支出七万万元以上。这种逐年增加惊人的军费支出数量，当然落在工农劳苦群众肩上，所以结果破坏了中国的经济，首先破坏的就是农村经济，于是群众的缺乏文化，乞丐化之过程加速，毫无疑义的了。这些条件使中国新的、更有力的革命高涨如农民暴动到处爆发不用说了。而这种影响不仅是军阀财政日趋于绌竭，军饷的无办法，而兵士暴动之发展进一步与农民斗争贯串一起，必然地使军阀制度趋于崩溃。

三　军阀军队的成份与其一般情形

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下，与军阀混战局面之下，农村经济破坏，其中破产农民，除到城市做工与当土匪而外，就到佣兵制度的军阀军队当兵。城市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因工业不发达不能稳定，甚至工厂倒闭，又产生了广大的长期脱离生产的游民无产阶级，也是往军阀军队去当兵。这是军阀军

队中一般的成份。

中国雇佣军队，它的组织系统，军事纪律，军队脱离人民而孤立的状态，这是中国军队一般实际情形，也就是我们在军队中工作困难的地方。但是，军阀制度的本身，已表现出许多矛盾，兵士与长官阶级冲突，下级官与上级官权力斗争是跟着社会阶级的矛盾而存在的。现在既有了这样广大的军队，资产豪绅阶级无力维持它，而各军阀为图本身生存与其发展，他们自己相互问，及其与一部分豪绅地主阶级帝国主义者间又发生许多新的矛盾，这些矛盾足以使军阀制度继续削弱与动摇，而且加剧了兵士的冲突。其冲突之焦点就是在经济上，因为它是雇佣制度，其表现于经济上之冲突是必然的。军阀的财政困难已如上述，而军官为增收入计，就发生了包烟包赌，争地盘，克扣其微小可怜之饷（四川二等兵月饷六元六角，还八折发下，广东二等兵月饷毫洋十元零五角），或甚至于久不发饷，士兵索饷即被扣留，偶尔发饷，便有逃兵，病者伤者均无优待办法。运动士兵，借着些病兵、伤兵之口，以向其他兵士宣传，极有效力。

官长与士兵生活相差太远，官长任意挥霍，居住饮食以至嫖赌，千金撒手即尽；而士兵则衣不暖身，食不饱肚。相形之下，士兵对长官之心理，可以想见。因此，官长防范士兵拐枪潜逃之法日渐严密，下级官以亲信者马井或骨肉任之，兵士出入，由下级官集团领导，下操后集武器于一室内，由下级官看守，所以下级官之作用大。但是因他的经济背景关系，我们为士兵运动容易入手，及将来暴动时利于指挥起见，不可忽视了他，在可能范围内须吸收之，但须慎重。至于望下级官而中级官，带其整个队伍来革命，又是幻想。总是要十分注意下层士兵才是。

至于南方的新军阀，自背叛革命后，取消了初期革命的宣传，屠杀工农，虐侍士兵，为权利地盘之斗争，驱遣士兵自相残杀。兵士因此受了更大的剥削与牺牲，对于官长蕴蓄着很深的阶级仇恨。他们的饷，一月只有十元零的毫洋，常是几月不发。恰好受了土地革命与广州暴动的影响，红军月饷二十元与分配土地给兵士的口号，以及他们本身的阶级斗争，联结到社会上工农斗争的关系，于是表现出反革命军队普遍动摇。民团商团的武装，多半在雇佣的卫人和农民手中，在此工农剧烈斗争的期间，他们必然的要受影响。他们同警察的武装、组织、训练、技术都较薄弱，是我们容易夺得武装的所在。

四　对军阀军队的工作

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议决案说，党应准备对付新的扩大的革命高潮之高涨，党对这新的高涨革命浪潮必须的任务，便是组织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因革命任务，是用武装暴动推翻现存政权才能解决。据此，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即要夺取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在政治上教育他们，使他们在共产党及其口号之下团结起来[3]。在实行夺取工农的中心工作时，同时马上就开始实行有系统的军事政治、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的工作，以保证最近的将来工农群众反对大批军阀军队斗争的胜利。在这工作当中，对于军阀军队军事运动的主要任务，是独立地运用在军阀军队中发展他们的阶级斗争，即是兵士与其官长的斗争（能拉他们的下级官与兵士同一战线时，即照上述意义办理，但非主要的事），这样才能把军阀的基础，根本地动摇它，推翻它。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仅用军事政治工作的方法，我们不能破坏整个的军队、或使它来参加革命，或是使它中立，其某部分军队，必永久是忠实地服从反动军官，积极地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则我们只有以我们的赤卫军为中心，同变到革命

方面来的军队，对它进行酷烈的血战，才可以破坏它们。列宁在一九〇五年莫斯科暴动的一篇文章写了以下的几句话：我们过去已经准备而且还须更坚决的准备改造兵士的思想。但是我们不会变成可怜的老先生，假若不会忘记在暴动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用血战的方法以夺取军队[4]。这是我们预先该知准备的，决不可再演出南昌时对蔡廷锴那种不坚决的态度。

军阀军队中单独的阶级斗争是没有出路的，而且容易和缓下去，一定要工农斗争愈发展，才可促进士兵的阶级斗争，且使斗争能够愈加有意识地走到与工农会合总暴动的路上。

无论当时的政治情形如何，共产党军事政治工作之一个首先的任务，便是要破坏并夺取统治阶级之武装力量，在海陆军警察中进行政治的与组织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们，这些熟悉军事的军队与警察有新的攻守器具为它的武装，以军官为特别的指挥人材，又有帝国主义者到中国军队之助，它们真正来与革命斗争，则虽具有革命胜利的条件，但它们也有消灭革命的可能。虽然如此，但是军阀军队和外国派来中国的军队，因阶级成份关系，上面曾经说过，在一般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不会不受革命影响的，在这时候，士兵群众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这种动摇能够引起部分的军队变到革命方面来，我们党在革命准备时期，尤其在夺取政权积极斗争时期，在士兵中有系统的工作，特别是政治工作愈做得有力，则士兵动摇与倒戈，将亦愈有力而常见。

因此，破坏军阀军队和在政治上夺取军阀的军队，使上百万的兵士群众都参加工人与农民群众的阶级战线，为中国共产党严重的任务。

上述工作具体形式：

1.在士兵中做群众鼓动工作，使士兵群众接受党的口号，为此必须有军事煽动员特别组织，并出版关于日常便于士兵群众阅读的刊物、传单和小册子等。煽动之法，须视其部队来源与成份，如部队是匪成的，就以运动土匪的方法对之。如是新兵，他们极感生活困苦，与不忍官长的惩罚，则派人人其部队为宜。如是外省军队，思家之心必切，则说明以月饷二十元回家是有路费有出路的。煽动军队之目的，须注意破坏敌士兵与官长的关系。而夺取其信仰，所以提出来的要求，须不使反动军官能以小利引诱士兵和缓，要以各种方法，利用各种问题煽动士兵，如厕所标语，图画，只要能鼓动群众破坏官长的威信，便都适用。唯宣传的口号传单等则应非常正确，宣传从士兵痛苦说起，然后说到工农兵联合，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以至于暴动的组织与其他技术问题。宣传的方法，通常是用口头谈话式的，然而有时文字的宣传亦非常有号召的力量，所以传单小册子等有时也是需要的。尤其是在少数军队单独住在一地之时，能以一种传单给予全部士兵，可以增加其动摇与恐慌的程度。

2.在军队中成立党的支部和革命士兵们的组织，以便在该部队中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使自己的人散布到军队，以便逐渐地扩大自己的影响，且于紧急的时候，把军阀军队吸引到革命方面来。我们在军队中党的发展，必须普遍地注重于质量，因为兵变多是少数人发动，组织此处与波处绝缘，恐其一处破坏，牵连全体。

士兵暴动是为夺取政权之意义的，必须与工农联合起来，最好是工农兵的总暴动。在士兵暴动时，工农愈有力量，方愈能抓住士兵群众，再则士兵暴动之时，党必须注意组织一基本部队，协同我们的赤卫队——中心部队以打破其他反动军队。

兵士自身单独的兵变，应当加以提倡。必须有士兵为本身问题发动的兵变，才能逐渐形成工农兵汇合的总暴动。兵变是没有夺取政权之意义的，但为破坏敌人的武装，兵变是对于我们革命和武装工农有利的事。士兵受着工农浪潮的影响，尤其是本省的军队，或由土匪散兵改编过来的军队，容易走上兵变的道路。自然党必须尽力使一切兵变在党的指导之下进行，尽量使工农的势力影响兵士，而准备能除去其武装或改编之。此种单独的兵变，在敌人部队移调防地，而我们工作有放弃之虞时，可实行之。在军阀互相吞并战争时，无论何方都要使它发生兵变，即是打败仗主义，这是极易收效、以其武装拿来武装工农的最好办法。因为佣兵作战，胁于官长命令，看见战场上官兵极悲惨之事，于本身毫无利益，倘若我们党在他们战地有组织，一面断绝前线军队与他们的高级官的联系，一面运动士兵导以出路，没有不成功的。

3.用各种方法帮助和发展士兵与长官的经济斗争，设法建立士兵和水手（海军）的群众组织。此种组织之适当的形式如“士兵联合会”和“水手联合会”等都可，其任务在保护士兵和水手（海军）的最基本的权利和其生活上最切身的利益。

我们的士兵运动，必须估计到雇佣军队的特点，提出于士兵有切身利害而且容易了解的口号，以启发他们的经济斗争。例如：

（1）兵士月饷二十元；
（2）发清欠饷；
（3）按月十足发饷；
（4）反对克扣军饷；
（5）军饷公开；
（6）反对官长打骂兵士；
（7）有病不出操；
（8）病兵伤兵要有疗养零用钱；
（9）反对剥夺士兵自由权；
（10）杀压迫士兵的官长；
（11）士兵不打工农——穷鬼不打穷鬼；
（12）杀屠杀工农的官长；
（13）士兵参加工农暴动；
（14）打倒财主佬，分银钱，分土地；
（15）士兵要田地房屋；
（16）不替军阀当炮灰；
（17）打倒不发饷的新军阀；
（18）打倒屠杀工农的新军阀；
（19）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军阀；
（20）一切士兵加入革命士兵联合会；
（21）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兵利益的。

象上面那类口号，是从他们物质生活的痛苦，说到了他们的出路，利用一切机会燃起和发展士兵与长官之冲突，我们要知道在军队中，要经过斗争，方能增加士兵阶级仇恨，而提高我们的领导权。但兵士的斗争比工人农民更易走人武装冲突，使我们的组织易于破坏。假如我们未准备兵变或暴动，须注意斗争的方式，不可过于激烈，只能使兵士受我们的影响为标准。例如闹饷，须用要求发饷等形式，使兵士对官长失去信仰；不能得饷时，应用消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手段宣传破坏官长的威信，而不即刻积极地行动，利用待遇问题如伙食或处罚等引起斗争，亦是好的，斗争方法是鼓动请求官长、包围官长、罢操等。

4.必须在各部队和参谋部成立通信的组织，其目的在时时侦察军队的情绪，并研究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之最适当的对象。

敌人军队的历史，军官成份（上级官、老军官），过去的斗争力，军官财产的来源与状况，人数与武装，营房生活条件，以及关于思想情况等，如能确切知道，我们一切工作才有正确的发展。其通信传达的方法，无论各部队或参谋部，可以利用我们的人在其中当号兵、伙夫，出入比较自由，至于借做小贩、洗衣、补衣亦可。

5.军阀军队的招募：（甲）自愿的，（乙）按县征募的，（丙）强迫的。在这些时候，从军的分子，按其阶级并不一致，中农、贫农、流氓分子都有。本党在自己工作中，应该注意到这种士兵成份的特点，使自己的工作与方法能够适应他们。

6.必须使工农分子加进军队去当兵或当官长（首先入军校）的方法普遍施行。

在中国一般人中，同样的在工农群众中，散布着反对军队的心理，不能不是工作困难之一。这种心理的来源，是连绵不断的军阀战争，旧式军队对于人民残酷地掠夺与蹂躏。“好人不当兵”成为农家的一种流行陈语[5]。最近几年的实际经验证明，这种心理已有极大的变化。工农群众已经了解，军队是一种力量，统治阶级应用这种力量，可以残酷地压迫劳苦群众。工农群众已经相信，只有破坏军阀的武装力量和创造自己的武装力量，才可以根本消灭旧有的强盗式的军阀军队。所以以前工人不当兵的（工资多于军饷金而且较自由），现已人军队当兵了。

派人加入军队者，以有特殊技能，如能代人写家信或能玩弄乐器者为宜，因为他们容易吸引许多士兵接近与来往。

五　党员军事化

中国一般人都有反对军队的心理，这种心理的来源与不好处，上面已经说过了。

我们共产主义者，要不相信考茨基的信徒说的革命不一定要暴力与流血，要不相信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说的不要拿武器吧，那么，对于军事，人人都要重视它，学习它，武装工农，领导工农，夺取政权。

苏联现在是已经革命成功的国家，我们看，他们在常备军中，一般工农群众中，以至于儿童中，尚且都是非常注意军事设备与训练，自然我们中国共产党员更应注意到暴动前之武装工农，乃至暴动后之建立红军，在需要军事人材，若不就此时急急的利用中同军阀军官学校、国外兄弟党及其他公开或不公开的军事组织，以学习军事，则将来革命前途必蒙大多的不利。我们学习的对象是：

1.使用武装方面。广州暴动工人百分之七十五不会打枪，甚至自己打死自己人，得着敌人三十门大炮，只用了五门，从这次可以看出使用现代武器的重要。我们对于射击以至手榴弹自然该学习，就是旧式的刀矛，我们也要利用它来夺取敌人的武器，也是应该学习的。

2.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术，如巷战如何设置障碍物、壕沟，如何侦探、救护、征发以及战地宣传等，都应充分地训练与学习。

3.技术，如造炸弹、复装弹药、修炮等的学习。4.暴动的策略非常复杂，

与常备军的通常策略不同，这种学习必须长期刻苦地研究才行。我们要知道，党员军事化，才能夺取政权，维持政权，巩固政权，才能说到中国革命胜利，世界革命胜利。

注　释

[1]尾大不掉，语出《左传·昭公十一年》：“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掉，犹摆动。比喻部属势力强大，难以驾驭。

[2]米夫，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人员。

[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中指出：“党应当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这一高潮，必须要党起来组织并实行群众的武装暴动之直接的策略任务，因为只有推翻砚存政权的方法，能够解决革命之种种任务。正因为如此，现时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组织他们，使他们围绕着党及党的口号（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统一中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推翻现存政权，工农独裁制，组织苏维埃）。”刘伯承讲的与此精神一致。

[4]列宁在《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一文中说：“我们曾经准备而且还要更顽强地准备在思想上‘影响’军队。但是，假使我们忘记在起义关头还需要进行肉搏斗争来争取军队，那我们就会成为可怜的书呆子。”《列宁选集》第一卷第六六七页。刘伯承的引文，与此精神一致。

[5]陈语：老话，四川方言。

南昌暴动始末记
（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

小　序

南昌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在历史上的第一页，可惜是失败了，在这当中牺牲了若干同志，换得来的是什么？可以说是失败中求得的教训。我是参加南昌暴动负军事责任的一人[1]，报告此次军事上之经过，为的是供我们的党在失败中研求教训之材料，以作此后革命进行之取鉴。但作这报告有三个缺点：

（1）南昌暴动，我是被四川、贵州军阀围攻失败[2]刚逃出来参加的，暴动前之经过我不能详尽叙述。

（2）失败时军事记录全失，此是凭回想叙述出来的，关于数字，不能正确地指出。

（3）失败后未能同各负责同志共同讨论，得一个很正确的结论，此是就个人知道的说出来的。

一　南昌暴动之前

（一）政治方面

自蒋介石叛变，在各处演屠杀案以后，当时与之敌对而尚在革命道上者，自然是武汉国民党政府。我们为强大自己的力量，扩大无产阶级的组织，分裂国民党对广大农民之领导，创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条件，自然该拥护它，保持我们革命的联盟。但是武汉国民党之分子，如徐谦、谭延闿之流，恐比南京方面[3]的人物更右得多。至于汪精卫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提到土地革命就摇摆不定。总之，他们离开革命队伍，是时间问题，离开的形式，自然的是与我们实行斗争。我们在他们未离开革命队伍之时，革命的联盟，不生问题，但在事前要时时准备着他们离开革命队伍时的斗争，代替国民党的领导。可惜我们的党胶执了联合小资产阶级表面上的一点，而无这样准备。自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屠杀农民起，经过郑州会议、徐州会议[4]；一直到唐生智回湖南，由查办许克祥变为驱除 C.P[5]的主张，武汉政府亦默认许克祥之屠杀农民为自卫，并下令军官监督政治工作人员，秘密开会者枪毙，解散工人纠察队及军事政治学校，并缴其枪械等等，我们的党，才根本消极的对武汉政府失望。其实自郑州会议以来，武汉政府也随着南京变成屠杀工农的机关，国民党完全变成反革命的团体，既然是与我们联盟的条件相反，联盟关系应该断绝，趁他们有事河南[6]，指导群情激昂的工农、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工人纠察队以及张发奎军中及其他同志队伍，在工农有力军事要点之两湖暴动起来与他们斗争。不应站在两湖及其他工农群众尾巴后面若干远，听他们屠杀以及解除我军事政治学校、工人纠察队等等武装。自然是这样一来，对南京及各方面不能说无困难，但总比迟至甚么力量也消沉时，才在南昌暴动好得一点。我们的党没有刚才所说的准备，到了武汉国民党清党[7]事起，同宁汉国民党有第三派运动成熟，各方部已联合好了而不容我们，而我们力量也消沉时，才有联结张发奎到广东的准备，张发奎亦有护送 C.P

---

① 南昌暴动失败后，刘伯承去苏联学习。一九二五年六～七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刘伯承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大会的“军事委员会”与“南昌暴动委员会”工作。七月七日，“南昌暴动委员会”开会，刘伯承的这篇讲话，是在这个会议上听作。“讲话”收入本书时，个别地方作了删节。

首领出海口这样滑稽的话。

（二）军事方面（仅与南昌暴动有直接关系的）

1.反革命的环赣兵力概要见，附表一。

2.参加南昌暴动的兵力概要，见附表二。

二　南昌暴动

（一）党的决定

我们的党曾看见了长江流域及其北方皆已成为反革命混战所在，而以广东（1）占军事地理上之优势，（2）工农运动之核心，（3）财政之丰裕，（4）交通之灵便等等，因此决定以我们同志的军队规取广东为革命根据地，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在军中指导一切。首先对张发奎犹未绝望，以为可以使之左倾，同到广东，及见汪精卫在九江拉拢了张发奎敌视我们，我们党才决定离开张发奎，将附表二内四部分军队在南昌暴动，单独打到广东去。打到广东的计议：（1）工农力量在东江的厚，（2）东江地形较北江平易，且敌军已集中于北江不能各个击破它，（3）东江海口便利，可望苏联接济，财政亦丰，（4）可以以福建为后方。因此，决定迅速的先取东江，充实力量，次取广州。

（二）八月一日

我们党的前敌委员会，令叶挺、贺龙等军队于八月一日午前二时围攻朱培德、程潜在南昌之队伍约三千多人，拂晓即经缴械。在此时，蔡廷锴及其军官有些还是不稳定的，贺龙等主张，一并扣留制裁，终未实行，以致演成进贤叛变的事来，为后来失败的一种原因。那天战事结束就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提出没收地主二百亩以上之上地的口号（后来到东江有个农民听着这口号就说，这是耕者无其田的口号），裁去一切苛捐杂税，提取政府银行之存款（现款数万，纸币三十万之谱）。此次英勇的暴动，谁也知道是我们党领导的，应该明白地将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宣布出来，但仍挂上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头衔及畏缩右倾的土地口号，真是一件恨事。在当时，以为拿出来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恐怕吓退了小资产阶级，抽了革命联合战线的力量，其实反减少了我们党在工农群众中的信仰。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组织，见附表三、四。

三　由南昌到广东

参谋团委员根据上述迅速的先取东江次取广州之决议，讨论是取道吉安、赣州取东江，或是取道临川、会昌取东江，结果决定由临川、会昌取东江，其理由是：

（1）吉安、赣州等地在上流方面，容易联合与集中的敌军将达四万（在粤汉道上李济琛嫡系不在内），我军兵力仅达二万（战斗兵员尚无此数），逆队攻之难操胜算，且对南昌下流有张发奎等一万以上敌军追击的顾虑，临川、会昌路上仅有杨如轩、赖世璜不满三千之无力敌军，容易应付，即敌人从他处调兵击我，陆行同等困难，我可各个击破它。

（2）交通上赣江虽比抚州河长，但同一上水，无多汽船可供使用，陆行则临川、会昌路线较直而短，迅速可到东江。

（3）江西农运均属不好，临川、会昌一带，较吉安、赣州一带尤为幼稚，如我军与集中之强敌相遇，望之扰敌均无把握，给养上吉安、赣州一带比临川、会昌充分，但秋收之时，临川、会昌路上并不困难。

（4）取道吉安、赣州接近湖南地境，与湖南农运力量自然容易联络，但

迅速到达农运更好之东江，才是我们之目的，况此道最可虑的，我军湘籍军人占大多数，无政治认识者不少，有时时叛逃之可能。

第一期　南昌——会昌

参谋团基于速到东江之企图，在南昌定好行军计划，是由南昌——临川——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向寻邬，计长一千二百里之主要道上，选的平行路，预计八月二日由南昌出发，二十六日集中寻邬，毕竟运动迟缓，到了二十六日才到达距离寻邬二百八十里之瑞金，途中又损失了许多军械弹药，叛逃了许多官兵，尤以南昌至临川一段为最。损失军械弹药的原因：（1）不能得多数力夫运输。（2）官兵未经训练者抛减其携带武器。叛逃官兵最著者，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在进贤叛变，归陈铭枢去了（解除我们同志在其部队之职务），我军就完全损失了战斗力强之一师。又第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及第二十军第五团约七百人，都叛逃归唐生智去了。其余概是零星逃散的。兹分析叛变的成份：（1）反动派，如蔡廷锴、陈裕新之流，这是我们在可能范围内，未取革命的断然手段的罪过。（2）无政治认识之营混子，感觉生活太苦而规避者，这是我们无管理训练的罪过。（3）因病落伍者，这是我军军医散失逃亡，卫生上设备不完之所致。

八月七日，我军到临川时，杨如轩军队约二千人不战而逃，往南城去了。我军给了农协一些武器，并委有众一千余人之土匪邓甘霖为赣东警备司令，令之协同阻扰敌军之来。

八月二十五日，我军到了王田市，当时李济琛与朱培德、张发奎妥协好了，己调他的右路总指挥钱大钧的七千人并附以由东江调来之苏世安、柏大民之两团，约二千余人来会昌、瑞金，其先头在壬田市布防堵截我军。又调他的中路总指挥黄绍竑的九千人，由赣州经雩都向我军前进中。张发奎的军队由黄琪翔统率，由南昌到了吉安，拟定回广东的，此时我军贺龙的兵力约有五千六百人，叶挺的兵力约有七千八百人，两部共约一万三千四百人，而战斗兵员则无此数。本欲乘钱大钧等兵力未集中而各个击破之，在壬田市就开始攻击，二十六日就攻人瑞金，可惜叶挺的军队未能依定时完全到齐，只贺龙的军队担任攻击，敌人未被歼灭的由瑞金向会昌退却了。在这时，又恐钱大钧再由会昌退回雩都。歼灭它不了，遂决定以叶挺的全军从西江市、洛口迂回其后，攻击会昌，贺龙的军队由瑞金正道攻击会昌。叶挺军于二十八日取得洛口（此时黄绍竑的军队亦由零都拟经洛口向会昌前进），而以主力猛攻会昌。贺龙所暂担任攻击的一方，因他未照预定计划由瑞金派出兵力，只派得有周逸群所指挥之一千余人攻击会昌，又被钱大钧击败了。好在叶挺方面军队质量较好，又迫于前后皆敌，死力奋斗，得于八月三十日午后五时，攻入会昌，并派兵尾追至筠门岭。此两战钱大钧指挥的军队，除伤亡、被俘、逃散的约六千人外，只剩得约三千人，向南逃窜。后来才知道，这三千人是分往武平、信丰窜梅县去的。此时黄绍竑军到洛口，果受了叶挺军的一营的欺骗，被抑留一日才攻取洛口，又探知会昌被我军攻克，遂未前进。此没叶挺军缴敌枪约两千，伤亡自己官兵约一千，以我们同志为最多。贺龙军于攻瑞金、会昌共缴敌枪约五百支，伤亡自己官兵约七百余人，也是我们同志最多。暴动时已感觉军事人材之缺乏，这次作战伤亡更感缺乏万分。我军得着了此两战胜利，何以不于此时照原定计划，取道寻邬人东江，而改由长汀、上杭人东江，其理由如下：

（1）经此战役叶贺两军共有兵额一万一千六百人（战斗兵员无此数），

最好与黄绍之九千人决战后再人东江，但侦察该军知会昌已失，屯驻洛口不动，有抑留我军之模样。攻他则其退路安全，必扑个空，反迟延我们到东江时日，致使敌人在东江有充分之准备；不攻他而追敌由寻邬入东江，则该军必尾蹑我后。取逍长汀，上杭，则无此顾虑，旦无其他敌人之顾虑。

（2）由瑞金经长汀、上杭人东江较由会昌经寻邬入东江好得多，巨其路程并不远于寻邬，其中有继会昌到瑞金九十里之旋回，然顺郭水而下韩江船可载大批战利品（枪五千支左右）与大批受伤官兵，得迅速地到东江；不然无力夫以过寻邬山路，况敌军有蹑后之趋势，枪械、伤者均无办法，必致遗失。

（3）我们此时不仅是在得米粮供给养，而且是在得现款分给士兵零用，长汀、上杭富饶，可以应求，而寻邬瘠苦则不能也。

（4）我军到寻邬集中之计划，为第二十军叛逃参谋长陈裕新告知武汉政府，披露各报，有改变计划之必要。

（5）福建为省中无力民军角逐之地，当时各有力军阀皆无兵驻其间，直可谓无主之物，取道长汀、上杭后方安全。

有人事后说，当时就由长汀人据漳州一带，充实兵员后再取广东，也是一个办法。但军事是根据政治决定的，由东江取广州是党于事前由政治上决定的，广东方面工作亦根据这一决定有相当之准备，所以无人提议及此问题以外的事，且在当时兵力太弱，迫切需要者在兵员补充，欲其速得，不能不望之联合于东江农军，故必速到东江。在事后看，就到漳州谁也难料敌人不立刻来福建作战，不过我们起初估量广东能调来东江与我作战敌军只有一万左右，这是失之于小，估量东江农民力量满能积极地阻扰敌人，牵制其若干兵力，这是失之过大，都是我们的错误。至于说到对敌谍报勤务，由上海派到广东去的同志不少，望他们陆续迎头报告，结果我军到汕头没有一个人回来。又广昌派作谍察同志领了钱未去，也不来说明未去的理由，结果查出来不加处罚，党的纪律不严，谍报亦等于零，这尤是我们军事上的缺点。

改道长汀、上杭入东江的计划，是八月三十一日决定开始实施的。九月二日停顿洛口之黄绍竑军突来攻击会昌，数小时不克即又退去，这也是抑留战术之表现，叶挺军伤亡二百余人，此时我军先头部队已向长汀出发在途了。

这一期由南昌带出的现洋仅数万，不甚值价之纸币，大概是三十万之谱，分发为各军的给养，曾在宜黄、临川议定先用纸洋收买地主谷米，或无代价征发其粮食，现洋则保存，最后在作战地区使用，将领有以王者之师[8]自居，认征发为羞耻事者，对地主亦禁用纸币，于是现洋不久用完，纸币离南昌愈难使用，负责筹款者，在旧的普遍派款，新的向地主勒款两办法之间游移不定，且途中倥偬，有钱者大半逃避，于是筹得之款甚微，不敷用度，至瑞金后，越感困难，影响于行军之迟缓，最后是粮秣管理处开始征发地主食品以供军用。

广昌以北曾见农运组织，但极幼稚，曾雇少数农民为力夫，其他无所表现，在广昌以南为赖世璜的反动军队驻防之下，无甚农运组织，且其他在蒋介石命令实行清党，在民众中作反动宣传十分厉害，傍路居民逃避极多，我军来在一地停驻，无从作我们党的宣传，革委各机关及各军中负政治工作者，只得照例写得一些解放农民条例全文，没收二百亩以卜之土地，继承国民党正统，打到广东去等等标语，顺道贴在路旁，这样工作自然不能生何等影响。对各地国民党，虽尽力寻得本地几人出来重新改组，但他们看得我军是要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